

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前面讲到如实、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之“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又更加不容易,因为它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千辛万苦的实践过程。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是通过长期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获得了真正实现的结果。而每一次“结合”的实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发展,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从今天来看,我认为马克思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所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努力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相一致的审

美观与艺术观,使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起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引导全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这无疑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它要求我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研究我们过去已研究过的种种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审美意识和艺术的巨大变化,研究西方现当代的各种文艺理论与美学流派,研究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大力进行综合性的理论创新。

最后,衷心祝愿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文艺研究》,继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奋勇前行,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感谢与希望

钱中文

《文艺研究》已经三十周岁了,它创刊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它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同步,它见证了我国文艺研究大发展的三十年。

《文艺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就像它的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样,包括了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这是我国文化界的一个十分独特的刊物,可以说没有别的刊物可以替代。刊物发表的文章,既涉及文学、美学、音乐、绘画、雕塑,也有关于电影、戏曲、书法方面的专业性著述,真是名副其实的“文艺研究”。正因为如此,《文艺研究》从它创刊时候起,就吸引了不少作家与各个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那时我们就不断读到不少著名的新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的高质量文章。其中特别是一些久已辍笔的老一代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如宗白华、朱光潜、钟敬文、王朝闻、蔡仪、黄药眠、陈涌、张庚、郭汉城、伍蠡甫、王元化、唐弢、钱谷融等,他们纷纷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新作,读着他们的文章,使人有久别之后重逢的亲切感。还有我国文艺界的巨擘

郭沫若、茅盾、丁玲、冰心、艾青、刘开渠、吕骥等,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面对这样的强大阵容,虽在春寒料峭之中,但我已经感到春天是会来临的。发表年长作家、学者观点不同的论著,不仅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而且也是《文艺研究》的一个好传统,可以说这是刊物对学术的一种爱护与尊重,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抢救学术财富的战略性措施,后来还刊有季羡林教授的自传性长文,年轻的学者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文艺研究》刊发的各种论文,学术含量厚重,其中文学理论、美学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文艺实践的直接参与者,《文艺研究》三十年的经历,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文学理论、美学方面不断探索的经历。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方针的指导下,《文艺研究》一开始就对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了批判,同时提出了多年来阻碍文艺发展的不少重要问题,其中特别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人性与阶级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十分有意思的,这

几个大问题都是几位老学者提出而展开了大讨论的。对于文艺工具论、文艺从属政治等提法,1979年就有专文进行质疑、批评。在反思的基础上,终于促成了1980年自上而下地对文学地位的重新阐释:文学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政治,这自然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文艺从从属于政治的地位解放出来,使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并在独立中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对文艺本身来说意义重大,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真有一种解放之感。《文艺研究》关于人性、阶级性、人道主义、人情味等问题的提出,具有首发意义,使得这场讨论和文艺与政治关系一样,在全国刊物上持续了好些年。人性、人道主义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密切了文学与人的关系,使文学获得了自身的灵魂。文学如果不通人性、没有人情,没有一种对于人的生存境况的人文关怀及其命运的叩问,它何以成为文学?文学的身份与灵魂两个大问题,我都参与过讨论,有所收获,但也存在旧有影响。现今文学评论中,对于一些作品里的恶俗描写用“他也是人”的借口给以抵挡,这就把批评的价值准则完全解构了。另一件使人不能忘怀的事是《文艺研究》创刊号就刊载了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的文章。这对于当时久久隔膜的我国读者来说完全是件新鲜的事,对我来说也是如此,而且我也是接受的。但是后来读到外国的一些现代派作家和我国的浅薄的介绍把现代派说得妙不可言的文章,一味贬抑现实主义,宣扬现实主义是僵死的反映,并要用现代主义来取代现实主义文学时,就引起了我的内心的怀疑,而不得不过来研究它们的各自特征。这时文学理论方面,《文艺研究》还发动了关于形象思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是人学、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灵感问题、艺术美、诗歌形式的民族化的讨论,此外还有其他不少理论问题。我也加入了一些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文艺研究》一开始就站到学术发展的前沿,显示了我国文艺研究的雄厚力量。它在理论上的多样化,它的配有中西绘画和雕塑图片的独特设计,更显出它的艺术面貌的丰富多彩。

随后是文学理论的方法论、文学观念热,这是被上世纪80年代初一系列的文学理论的讨论所积

累的经验所准备好了的。这一段时候,有不少学者在思考文学本质的问题,都希望在文学观念方面有所更新,以适应文学实践的需要,从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70年代末,就有关于艺术生产问题的讨论,后有认识论文学观的坚持,有作家关于“纯文学”观的倡导,有在韦勒克等人提出的文学的内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语言、修辞、形式而后转向审美论或审美主义的文学观,有文学象征论、主体论文学观,有在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来规范文学观念的尝试,有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来阐释文学本质的思考。多年的文学理论的参与活动与对于上述种种文学观念的思考与反复衡量,促使我与其他学者一起提出了审美反映论,同时形成了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观念论,并以马恩提出的历史的回溯方法,历史地探讨了我提出的文学观念的源起。需要感谢的是《文艺研究》很快地刊载了我的这些论文,因为那时有的刊物大概认为我“左”,拒发我自认为用力最勤的论述审美反映的长文,后来我对这些论文稍加整理,作为核心思想,写入了我的《文学原理——发展论》。而“左派”则认为我“右”,形势一变就对我同其他学者一起提出的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观念进行批判了。这种两难境地,反倒使我高兴,在学术上我就是要走“中间”道路,即在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不左不右,以学理为重,吸取各家各派长处,为我所用,确立自己的学术领域与学术个性。

90年代初的一个时期,一般被称为反思的时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学理论慢慢失去了80年代那种轰动效应,文学理论比较平静地讨论了自身的诸多问题而有所深入。1993年《文艺研究》以“拓展理论思维”为号召,推出一组力主运用后现代主义思维研究文学理论的尝试。但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有关这方面的介绍与论述,较多地发表在其他报刊上,在《文艺研究》上这方面只有个别文章被刊载出来。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的介绍与张扬,主要到90年代以后和新世纪初,一批中年学者经过各种尝试、实践与操练,终于以文化研究为载体,大力推行而后发展成为流行一时的新思潮。提出的主要问题有文学艺术消亡论,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

理论,提倡反本质主义,以知识零碎化替代知识系统化与大叙事,以文学性研究代替文本与文学研究,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大众文化消解审美与非审美、严肃文学与大众消费文学的界限,以极端的相对主义消解与替代必要的价值判断,遇到低俗的审美现象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碰上自己不称意的东西就提出需要进行政治批判,等等。这类文章在《文艺研究》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有相当的深度,学风也好,争论是价值的增值,而非凶狠的绞杀与消灭。

最近几年来《文艺研究》有关文学理论方面所发的论文,内容丰富,水平大有提高,而且是全方位的,这与我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实力提高有关系。例如在对待外国文化研究的批判方面、审美超越问题、艺术的终结与重生、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文学救赎功能的变迁、文学批评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和谐统一、视觉文化研究中的问题、“后理论时代”西方文化症候、超越意识美学与身体美学的对立、审美共通感与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的发展和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模式、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生态美学等文章,既有知识,又有作者自主的观点,是很耐读的。其他如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外国文论研究方面都是如此,高质量的论文很多。

最后提几点希望。要办好一个刊物,首先,我以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要以现代性为动力,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因此及时把握当代文化、文艺思想的潮流是极为重要的。以现代性为动力,就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理论创新的契机,追求理论的新发展,使理论适合我们当今文艺实践的需要。以现代性为动力,就需要不断反思与自我批判,抛弃僵化与教条,而有所鉴别与借鉴,在发展中不断创新。以现代性为动力,就是要建设现代需要的文学理论,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而不是凌空蹈虚的后现代理论,尽管现实生活的零碎化、碎片化、不确定性在加剧,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大叙事的创新。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文学理论一直不满足于现状,不断在求新求变,而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我觉得《文艺研究》有着其他杂志所不具的独特的经历,这就是

与我国科学家的对话。钱学森院士几次有关文学艺术的谈话,都发表在《文艺研究》上,论及的问题都是文艺研究中的根本问题,从思维问题到哲学概括,高屋建瓴,谈得十分精彩。如果今后能够邀请一些人文素养深厚的自然科学家不断来谈些文艺问题,并且形成一种机制,我想是可能产生出一些思想的火花,通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某种程度融合而形成的新思想,来改变我们的文艺研究面貌的。我希望把自然科学家所积累的财富转换为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财富,从而使文艺研究的水平获得提升。

其次是学术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我不反对大力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我自己就做过、做着这样的工作。外国的文化、文艺思想是我们建设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资源,闭门造车已成过去。有的外国的文化、文艺思想与我们接近些,有的远一些,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都是有用的。但是我还没有发现,有哪一种外国文化、文艺思想直接适合我们,我们只要搬过来就可以使用。其实,即使那种特别接近我们的东西,也是一定需要进行转化工作,通过批判吸收而使其适合我们自身,成为我们的血肉,方可投入应用。比如前几年《文艺研究》上刊载一篇有关“文学死了”、今后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是研究现代性的文章。尽管这篇文章的已故作者是我的朋友,有过广泛的交谈,但我并不同意他的这一观点,我总觉得这篇论文是介绍与挪用。后来“文学性”一词被无限放大,到处运用,但至今未有有点分量的成果。而就在同期这篇文章的前面刊有另一篇文章,谈的是同一问题,论点、结论却是完全不同。该文比较真实、客观地介绍了外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及其今天的处境,它并未被普遍的接受;由于它取消了文本,或只是搭上文本,以致形成了课堂教学、研究对象的零散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了讨论、教学的空泛性,从而在教学中掏空了文学的价值与精神,以及引起它的倡导者的沉痛的反思,结论是需要回到文本。这样的介绍比较真实,而无耸人听闻的感觉,这就不是挪用,而带有独立自主性的判断了。

再其次,三十年来,《文艺研究》可以说培养了大批新学者。80年代上半期,《文艺研究》的作者以老作家、老专家居多,插进去的几位年轻作者,那是很了不起的了,如周宪、徐贲、徐岱、曹顺庆、叶廷芳

等(同辈人不算在内)。后来《文艺研究》上不断出现青年人的论说,他们在理论上很有锐气,学问扎实,现在他们由青年而至中年,在文学理论、古代文论、比较文论、外国文学研究中成绩斐然,通过《文艺研究》,他们和前面那些学者一起,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友。现在青年学者就更多了,队伍更壮大了。他们的新的思想、新的话语,正在改变着《文艺研究》的面貌,而更趋向新的当代。衷心地希望能够继续这一好传统,通过他们,开辟文学理论的新时代。

坚守理念,开阔视野,引领文潮

阎国忠

《文艺研究》三十年是伴随改革开放走过来的。它是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一个非常耀眼的侧面——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生机勃勃、日趋繁荣的景象。

美学是思想、文化、文学、艺术荟萃之地,同时是衡量它的一个尺度。

三十年中,美学最大的变化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受当时政治斗争和哲学思潮的影响,上世纪50、60年代美学被卷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中,四大派各树一帜,各据一方。经过几个回合的讨论和辩论,人们意识到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虽然不能离开主观与客观这类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审美活动是如何形成或审美愉悦是如何发生的。实践,是一种回答。实践美学渐渐在美学界占据了主流。但是,实践如果指的是“人化自然”的实践,这是群体的、物质的实践,而审美活动是个体的、精神的活动,中间至少有许多环节尚需要给以说明。后实践美学及其他非实践美学的兴起,一下子把实践美学背后的许多重要的问题翻腾出来了。审美的生理与心理的关系,感性与理性关系,经验与超验的关系,原始意象与现实感受的关系,认识、情感与信仰的关系等等都成了人们关注的重心。于是美学向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延伸开去,形成了广大的发展空间,并产生了空前广泛的影响力。

《文艺研究》遵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现实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理念,见证并引领了这一历史性过程。

印象很深的是,创刊伊始,《文艺研究》就首发了毛泽东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周恩来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刘少奇的《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等,随后,又刊发了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这是在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期具有指导性、纲领性的文献。这些文献,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就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批判继承等做了重新解读,进一步强调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发展繁荣文学艺术的意义,号召作家和艺术家在广泛吸收和借鉴中国古代和西方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和风格的作品。这些文献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话语空间。

此后,《文艺研究》就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相关的人性论、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讨论可以看作是美学以及文艺学领域思想解放的契机和开端。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并没有很深奥的道理,但是由于它向“人性即阶级性”或“社会性”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把人性归结为自然性,产生了极富爆炸性的影响,引发了长久的学术论争。只《文艺研究》,从1979年第3期到1984